

吉首大学民族学学术文库
生态民族学研究丛书
罗康隆◎主编

文化自觉与文化生态保护

腊尔山地区苗族文化生态保护研究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search on Miao Cul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Laershan Region

石群勇◎著

民族出版社

吉首大学民族学学术文库·生态民族学研究丛书

文化自觉与文化生态保护

—— 腊尔山地区苗族文化生态保护研究

石群勇◎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自觉与文化生态保护：腊尔山地区苗族文化生态保护研究 / 石群勇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7

(生态民族学研究丛书 / 罗康隆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1605 - 8

I. ①文… II. ①石… III. ①苗族—民族文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国 IV. ①K281.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3219 号

文化自觉与文化生态保护：腊尔山地区苗族文化生态保护研究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电 话：010 - 64228001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网 址：<http://www.mzpbs.com>

印 刷：北京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358 千字

印 张：21.875

定 价：37.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1605 - 8 / K · 2042 (汉 113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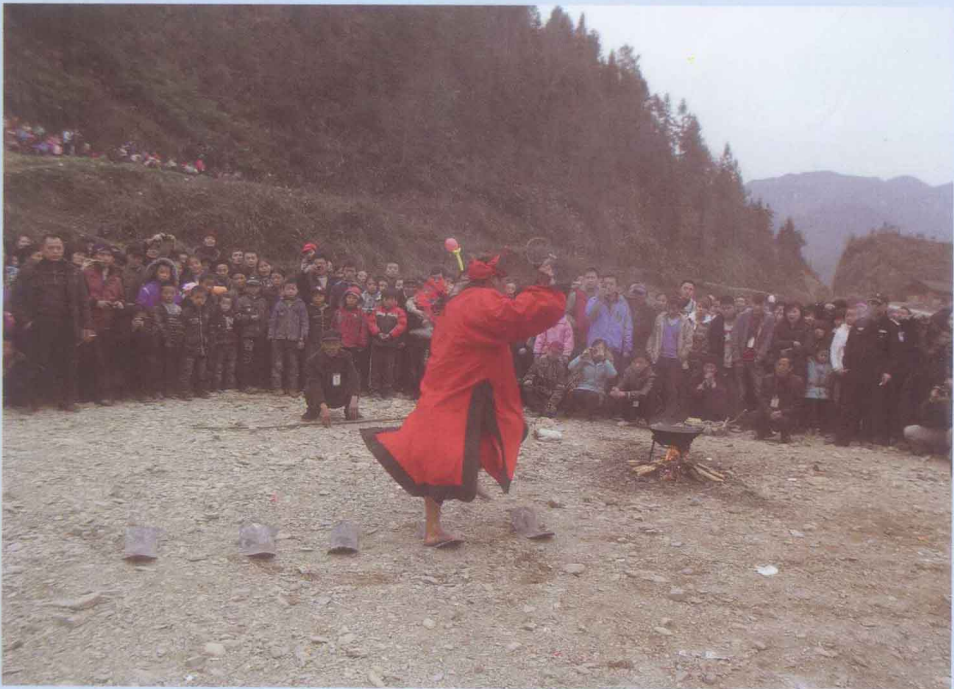
苗家拦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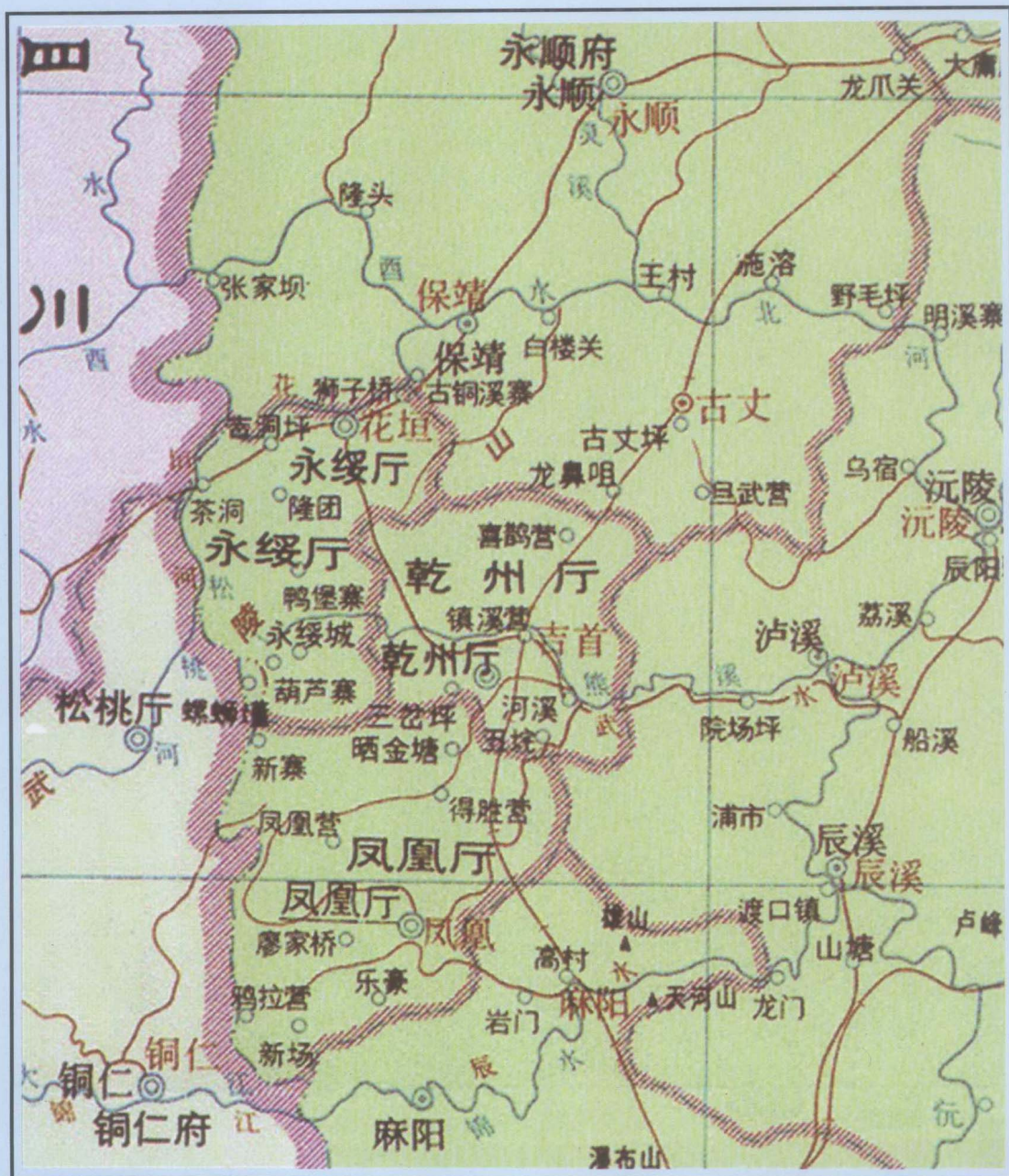
苗族四月八跳花跳月



苗族巴代



清朝时期腊尔山地区苗族分布区域图



本图来源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代总序：生态民族学在中国

罗康隆

于此，我们将“文化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等，关注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问题，并展开系统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统一称为“生态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和主要研究社会和生态学方面的生态人类学”^①。从环境的视角，研究环境与人类的关系通常属于生态学的范畴；但从人类的角度，研究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乃属于生态民族学的范畴。在生态民族学的范畴中，除了关注人类的生物性外，还需要探讨人类的精神生活，更关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因此，生态民族学是指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关系的学科。

“生态民族学”一词的正式使用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在西方兴起的生态民族学，有其学科发展的知识基础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环境可能主义、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主义、生态系统途径及民族生态学。^②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学的整体复兴，生态民族学在中国才崭露头角。经过30余年的发展，生态民族学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认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当今，随着“环境问题”的激化，生态民族学必将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学说之一。^③

^① [日] 绫部恒雄著，周星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145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② 李霞：《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载《国外社会科学》，2000（6）。

^③ 罗康隆：《人类的生态困境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一、翻译介绍国外的理论和成果

有关国外生态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主要以翻译和推介国外学者著作中的相关篇章为主。此项工作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操办,所推介的国外学者的著述片段,大多刊登在《民族译丛》、《世界民族》等期刊中。^①虽然仅是国外生态民族学著作的片段,但却能集中反映了生态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其中,对美国“文化生态学”和苏联“民族生态学”的介绍较为系统,因而对中国学者较好地把握生态民族学的实质和核心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庆仁、张雪慧、殷剑平等学者为此做出了较大贡献。接着,国外一些生态民族学的专著也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如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1988年)、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1989年)就是如此。

20世纪90年代以后,推介工作更趋系统、周详。1998年,《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4期发表了凯·米尔顿的《多种生态学:人类学、文化与环境》一文。尔后,该文选编进了2000年出版的《人类学的趋势》一书。该文系统阐明了多年来人类学对人与环境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而探讨此项研究与当时全球公众对环境问题热议之间的关系。文章对中国学者厘清人类学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独特观点,揭示当代环境问题的实质,具有积极的作用。^②

2002年初,华夏出版社推出的“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问世,其中就收录了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一书。《努尔人》研究的对象是非洲尼罗河畔一个尚未建立国家的部落,着重阐述了该部落如何组织成有序社群这一重大问题。社会制度是该书研究的主题,但是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结论却认为,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社会制度的建构机

^① [美] R. Mc. 内亭:《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载《世界民族》,1985(3); [日] 田中二郎:《生态人类学》,载《世界民族》,1987(3); [美] L. H. 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载《世界民族》,1988(6)。

^② [英] 凯·米尔顿:《多种生态学:人类学、文化与环境》,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4)。

制。努尔人的村落在雨季时，分散在一定的地域内；在旱季时，则集中到河流附近。他们的非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正与这种聚落方式密切关联。^① 社会制度与生态环境其实是互为表里。因而，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堪称是生态民族学的开山之作。

2002年末，由郭凡、邹和翻译的《生态人类学》出版。该书原作者是美国人唐纳德·L·哈迪斯蒂。这是中国第一本以“生态人类学”命名的译著。原作者在“前言”中写到，他写作本书的动因有两个：一是他相信生态学观点对人类专业的学生有帮助；二是他此前一直没有找到一本能满足生态人类学课程要求的教科书，也没有作为生态学课程补充读物的参考书。可见，该书是为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编写的教材。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人类学/民族学尚在发展中，生态民族学的研究更显稚嫩。此书作为第一本系统阐述生态民族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著作，对推进中国生态民族学学科建设无疑起到了奠基作用。^②

2006年，另一本《生态人类学》被翻译出版。这是一群由日本生态民族学家合作完成的论文集。该书被收入云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21世纪人类学文库”之中，尹绍亭参与了翻译并撰写序言。“序言”中提到，生态人类学已经成为当人类学最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而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可供参考的信息太少、资料不多，这对该学科的发展十分不利。《生态人类学》一书的翻译出版，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该书不是纯粹的理论著作，田野个案穿插其中，使人在了解亚洲、非洲、南美洲和欧洲等一些地区土著文化和生活的同时，也能学习到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该书对学生和年轻学者来说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这样一些作品的翻译出版，不仅有利于国内学者提高理论水平，也促进了国内研究的开展。

在翻译国外论著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着手撰写生态民族学专论，系统讨论生态民族学的理论渊源、学科定位，以及方法论等有关生态民族学学

^① [英] 埃文斯·普里查德著，褚建芳等译：《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70~12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② [美]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郭凡等译：《生态人类学》，23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科建设的重大问题。2000年,李霞的《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两篇论文正式刊发,文中介绍了生态民族学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她认为:这一过程的实质正在于,经历了从自然看文化到从文化看自然的视角转变,而这一过程正好是一部活生生的当代美国人类学/民族学史。^①罗康隆在梳理学科发展历程时,强调生态民族学的研究,必须聚焦于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探究。并指出资源是环境中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源本身具有多样性,需要人类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模塑出人类生计方式多样性来,才能与之相互匹配。人类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也必然会创造出利用资源的多元化途径来。^②同一时期的任国英的论文,则不仅涉及生态民族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还对该学科的主要理论作了归纳,并揭示了新近的发展倾向,进而对生态民族学的含义作了论辩。明确指出生态民族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借用生态学的知识,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分析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③蔡琼、雷艳则重点对生态民族学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特征进行了分析。^④张曦则把生态民族学的研究指向解读为生态意义的探析,使之形成新的观念体系,并以此匡正人类过于趋利的行为。^⑤尹绍亭和赵文娟则提出运用生态民族学的方法去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希望形成人类生态环境史研究的角度与特色,^⑥作为生态民族学特有的研究范畴。

① 李霞:《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载《民族研究》,2000(5)。

② 罗康隆:《生态人类学述略》,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③ 任国英:《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载《黑龙江民族译丛》,2004(5)。

④ 蔡琼等:《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源流及其后现代特征》,载《黑龙江民族译丛》,2004(5)。

⑤ 张曦:《生态人类学思想述评》,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⑥ 尹绍亭等:《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二、中国学者的生态民族学研究概况

1. 生态民族学的理论探索

随着国外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介绍的与日俱增，中国学者对生态民族学学科理论的探讨也日趋深入，表现为本土的生态民族学著述陆续问世。生态民族学在中国学界的影响也渐趋扩大。20世纪80年代，尹绍亭就开始关注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并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完成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1991年）和《云南刀耕火种志》（1994年）等著作。两书成了中国生态民族学的开创之作。1992年由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撰写的《民族、文化与生境》，以较大篇幅论述了民族与所处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①此后，高力士的《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②、尹绍亭的《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③、杨庭硕、吕永锋的《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④、罗康隆的《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生态文化的思考》^⑤等都能分别凭借不同的实证资料，完善了生态民族学的理论建构。《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特别开辟了“生态人类学研究专栏”，共刊发了11篇文章，包括对生态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和范畴的尝试性探讨，也提供了不少个案研究。^⑥这些成果的特点在于，重点关注了生态民族学的中国本土问题。研究者大都能凭借长期的田野调查工作，依托于详实的实证资料，致使形成的结论开始具有了生态民族学中国

① 杨庭硕等：《民族、文化与生境》，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② 高力士著，何昌邑等译：《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③ 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④ 杨庭硕等：《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⑤ 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生态文化的思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⑥ 陆永刚：《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麻春霞：《生态人类学的方法论》；田红：《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崔海洋：《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构架论略》等，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化的特色。

2006年,民族出版社开始推出一套由吉首大学罗康隆主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丛书”,该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四本,它们分别是《发展与代价: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生态人类学导论》、《本土生态知识引论》和《传统文化中的生计策略:以侗族为个例》。其中,杨庭硕的《生态人类学导论》是第一本由国内学者撰写、系统阐述中国生态民族学理论的专著。从论文来看,如《生态人类学与新疆文化特征再认识》^①、《生态人类学与西藏草地研究》^②、《云南新平花腰傣野菜采集的生态人类学研究》^③、《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④等都采用了生态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对新疆文化一些基本特征的重新认识,还是对西藏草业发展模式提供客观建议,亦或是对新平花腰傣野菜采集特征的总结,都是以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见长。杨庭硕和罗康隆的系列论文^⑤,则取材于我国各民族的代表性本土生态知识,阐明它们在生态维护中的特殊价值,从而将生态民族学的理论研究推向了实际应用。

在中国生态民族学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人物不能不提,他就是著名民族学家宋蜀华。宋蜀华一生致力于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和建设,一生坚持从事民族学的中国化理论探索,同时也在生态民族学研究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

① 崔廷虎等:《生态人类学与新疆文化特征再认识》,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② 白玛措:《生态人类学与西藏草地研究》,载《中国藏学》,2005(4)。

③ 崔明昆:《云南新平花腰傣野菜采集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④ 麻国庆:《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1)。

⑤ 杨庭硕:《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罗康隆:《地方性生态知识对区域生态资源维护与利用的价值》,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罗康隆:《论苗族传统生态知识在区域生态维护中的价值》,载《思想战线》,2010(2);罗康隆:《论侗族民间生态智慧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价值》,载《广西民族研究》,2008(4);罗康隆:《侗族传统生计方式与生态安全的文化阐释》,载《思想战线》,2009(2);罗康隆:《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地方性知识反思》,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罗康隆:《The Value of the Miao people's Traditional Knowledge for a Solution to Rocky Desertification in Mashan》,载《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2011(1)。

献。1995年,宋蜀华就发表了《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学与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①一文,呼吁民族学界的同仁要重视生态环境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此后的《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②和《生态人类学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研究》^③等都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化。宋蜀华对中国生态民族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对西方生态民族学的某些观点提出补充和修正。他认为生态民族学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共时态的研究,还必须辅以历时性的考察。中国各民族历史悠久,在发展历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推进,因而,生态民族学的研究必须纵横结合才能揭示生态变迁的实质。此外,外国学人过分关注民族文化对所处环境的被动适应,宋蜀华则主张仅注意到具有被动适应能力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关注文化对所处环境的再创造功能。二是宋蜀华对中国的文化生态区系的划分做了符合中国实情的尝试。他将我国境内的各民族的文化生态区系区分为三大区系:①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②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③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宋蜀华的这一尝试奠定了我国生态民族学区系划分的基础,开创了中国文化生态区系归属研究的先河。三是宋蜀华矢志坚持生态民族学研究的应用化,即把生态环境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④,以便为中国各民族现代化的最佳途径选择,做出了前瞻性的预测和建言。

宋蜀华认为:“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它把人类文化和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因而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特点、方式及规律,并寻求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生态环境,以及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及其和所处自然生态

① 宋蜀华:《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学与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见《民族学研究(第十一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② 宋蜀华:《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③ 宋蜀华:《生态人类学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研究》,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中国民族学纵横》,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④ 王庆仁等:《宋蜀华先生对中国民族学理论的探索》,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与生物资源的同时，又能精心维护所处生态系统的安全。^①

游俊等人认为：生态民族学“是以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生态后果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系统的资料搜集去阐明人类的社会活动对所处生态环境的影响，其中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以便进一步弄清人类社会与所处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从而找出对付生态环境蜕变的措施，在实践中去探求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最佳模式”^②。

从学科的视野予以探讨，不仅有理论方面的意义，更有现实或实践方面的意义，这与民族学研究中的应用取向和旨趣相一致。与此同时，学者们在对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过程中，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也给予了阐述，说明它是人类适应环境的重要机制，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保障。

2. 生态民族学的应用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新的生态问题陆续暴露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许多民族学学者开始尝试将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在解决现实生态问题的同时，也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来体现生态民族学学科的价值。生态民族学研究的领域随之向实践应用方向延伸。

1998年尹绍亭主持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就是生态民族学这一新趋向的典范。他认为：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文化多样性与生态环境多样性的相互关系，如何维护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从而谋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人类学十分关注的问题。^③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就是以保护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重建良好的生态环境、谋求乡村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为旨的课题。在5个试点村的建设过程中，他注重村民当家做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同时也强调政府的支持和学者的指导。试点之一的仙人洞村的建设过程就较好地体现了学者的价值。^④经过8

① 杨庭硕等：《本土生态知识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② 游俊等：《生态人类学田野调查纲要概说》，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③ 尹绍亭：《民族文化生态村：一个生态人类学的课题》，见林超民主编：《民族学通报（第一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④ 王国祥：《民族旅游地区保护与开发互动机制探索》，载《云南社会科学》，2003（2）。

年的努力,有的村落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有的村落尚待完善。但无论怎样,作为开创性的事业其经验和教训都会对以后生态民族学的应用性研究产生影响。

2007年,吉首大学启动的福特基金项目“中国西部各民族地方性生态知识发掘、传承、推广及利用研究”(RLER),也是一项应用性的研究工作。除此之外,吉首大学还在我国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17个生态民族学田野调查基地,极力开展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的治理、水资源的维护、中华蜂的保种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等应用研究工作。

另外,随着民族学的发展,以及生态问题的不断加剧,生态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内蒙古鄂托克旗生态移民的人类学思考》、《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水满村的事例》^①就是这样的例子。文化和环境是互动的。当生态环境遭到损害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不应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或急功近利,简单效仿别人,采取“一刀切”办法,进而忽视民族文化的作用。^②有关生态民族学应用的这一思想,在21世纪开始得到了学术界和行政部门的首肯,从而推动了生态民族学的实践应用。

3. 生态环境史研究

环境史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起,逐步成了国际史学界高度关注的新领域。在中国,尽管史学界对生态史的反应相对迟缓,但习惯所染,生态史在中国仍然被认为是史学的专门领域。时至今日,有关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主要还是由史学家去完成,而且成果喜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史学界的传统观念,唤起了史学界的同仁对生态环境史的关注,同时也唤起了生态民族学研究者的支持。如南开大学的王利华^③,北京师范大学的梅雪芹^④,复旦

① 良警宇:《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水满村的事例》,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② 任国英:《内蒙古鄂托克旗生态移民的人类学思考》,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5)。

③ 王利华: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年以来到2011年,发表生态环境史方面的学术论著39篇。

④ 梅雪芹: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年以来到2011年,发表生态环境史方面的学术论著35篇。